

第一章

引論

一、二十世紀東亞儒學史中的徐復觀

徐復觀¹（1904-1982）在二十世紀港臺新儒家學者中，不論在經歷或思想上，都別樹一幟，極具特殊性。作為中國當代新儒家的一員健將，徐復觀和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等人一樣地，面對二十世紀以降中國人所面臨的由「道德的迷失」、「存在的迷失」、「形上的迷失」所構成的「意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meaning）的思想困局，²苦心孤詣努力重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道德價值系統，以作為現代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憑藉。徐復觀與唐君毅、牟宗三一樣，都受到熊十力（1885-1968）的啟示與感召，³以全副的生命為振興中國文化而獻身，⁴他們以畢生心血將他們對時代的悲願化而為一

¹ 根據徐先生自述，徐復觀出生的年月日是 1904 年 1 月 3 日。見黎漢基、曹永洋編：《徐復觀家書集》（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 年），頁 400。

² 參考 Hao Chang,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76-304.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頁 79-116。

³ 杜維明（1940-）認為熊十力的成就在於其「存有論的睿智」，參考 Wei-ming Tu, “Hsiung Shih-li’s Quest for Authentic Existence,”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ed. Charlotte Fur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42-275.

⁴ 唐、牟、徐三先生及張君勱（1887-1969）在 1958 年發表〈為中國文化敬

部部思路綿密的著作，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心靈的見證。

但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家學者中，徐復觀與其他同時代的中國新儒家卻又同中有異。徐復觀與唐君毅、牟宗三在批判科學實證論時，固然都採取張灝（1937-）所謂的「反實證的思考模式」（*anti-positivistic mode of thinking*），⁵但是他們之間的對比卻也十分鮮明——這是歷史學（徐）與形上學（唐、牟）的對比。另外，在歷史研究領域裡，徐復觀與錢穆（賓四，1895-1990）的對比也頗為強烈——錢賓四強調中國知識份子與歷代政權的和諧關係，而徐復觀則側重兩者的緊張性。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中，徐復觀是如此地突出：他是一個出身湖北浠水的農村子弟，他從泥土中獲得生命的動力，⁶他好像一隻土撥鼠，從中國農村的泥土裡探出頭來，以他鐮射似的眼光與睿智，掃描傳統中國文化的病根，診斷現代中國的苦痛，從思想史角度開出治療病灶的藥方，為這個時代留下了為數可觀的著作。

從二十世紀東亞儒學的視野來看，徐復觀的思想也有其特殊性。徐復觀分析傳統中國文化時，特別強調農業、農村、農民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基礎，他希望未來的中國能在自耕農階級的基礎之上，開展民主政治的花朵。二十世紀日本知識界中與

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評論》9卷1期（1958年1月1日），這份文獻可以視為他們生命與學術的證言。

⁵ Hao Chang,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p. 288.

⁶ 徐復觀說他自己不怕被打倒，他「只要一倒在地上，聞到泥土的氣味，就會復活」，見王曉波：〈憶徐復觀先生——他行走過厄難困頓的中國〉，《大地生活》1卷8期（1982年6月），頁40-43，引文見頁42。

徐復觀一樣地對《論語》推崇備至的澀澤榮一（號青淵，1840-1931），則放棄農本主義，而期待《論語》與算盤的結合，能替未來的東亞開拓「義利合一」的儒家資本主義精神。另外，徐復觀對近代西方文化展開極為凌厲的批判，但二十世紀日本知識界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及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都對西方近代文化不勝其推崇嚮往之情，兩者又構成鮮明的對比。

不論從二十世紀中國儒學或東亞知識界的角度來看，徐復觀都是一個生意盎然、活力四射的學者與思想家。他的生命情調與他同時代中國當代儒家學者固然大異其趣，他的思想與他同時代的日本思想人物相較，更是具體突顯中國文化在他生命中所打上的深刻的烙印。

二、徐復觀的終極關懷

徐復觀畢生的學思歷程展現一項通貫性的終極關懷：「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幾乎就是二十世紀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魂牽夢縈的問題，具體的體現在「『民族的』與『民主的』如何融合？」這個問題之上。徐復觀畢生殫精竭力地思考的就是這個盤桓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心頭上的巨大問題。這個問題中所謂「民族的」指傳統中國文化而言，「民主的」是指源自近二百年來西方的民主政治生活方式。如何從以農為本的、以儒學為主流的傳統中國文化中，開出現代的民主政治？這是從 1919 年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共同關懷的課題。徐復觀探索這個問題而撰寫的諸多著作，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之中有其作為當代儒家學者的代表性，但是徐復觀的學思

歷程中的日本因素，使他與其他同時代的當代中國新儒學又有了明顯的區隔，又因他通過日文著作瞭解西方近代文化並以日本文化作為參照而思考中國文化，而有其特殊性。徐復觀及其思想確實是二十世紀東亞儒學史中重要的一章。

三、本書結構

為了刻畫徐復觀在二十世紀儒學史上的代表性與特殊性，我在這部書裡基本上採取比較思想史的方法，將徐復觀和他的思想，放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以及東亞思想史的廣袤視野中加以分析，並取之而與他的思想論敵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互作比較，也與他的儒學同志唐君毅、牟宗三對勘，既觀其同調，又論其異趣；我也將徐復觀思想與近代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及有「近代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1840-1931）的思想互作比較，以觀察徐復觀思想的「中國特質」，檢驗傳統中國文化以及他自己早年的農村經驗在他的生命中所刻劃的印記。

這部書共包括七章，第一章「引論」勾勒在二十世紀東亞儒學史上徐復觀的特質及其終極關懷；第二章探討徐復觀的思想史方法論及其在諸多論著中的落實；第三章則討論徐復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釋，並分析他如何通過為中國文化定性而為他自己的自我定位，安頓他漂遊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動盪與乖離之中的「流浪者的靈魂」；第四章分析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討論，這是他思考「中國文化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時的第一個參照系；第五章接著檢視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

評論，這是他思考「中國文化往何處去」時的第二個參照系。第六章進一步分析徐復觀通過賦古典儒學以新義而探索中國文化創新的可能途徑。第七章則綜合本書各章的論述，聚焦在東亞文化交流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以及「文化的特殊性」與「文化的普遍性」的辯論性關係而提出結論。